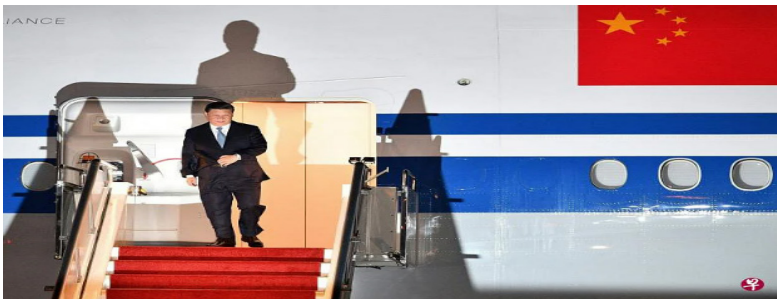


习近平主政10年

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斗争时代（上）



2018年11月15日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峰会。中国过去10年的外交政策变化，深受领导人个人色彩影响。（法新社）

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的10年，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随之发生转变，外交官员比以往更咄咄逼人，他们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出击，抢占舆论阵地，捍卫中国立场。北京称之为“有所作为”，在国际媒体笔下是“战狼外交”。学者指出，自信的“新时代”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的治理态度，而这种治理态度是“基于对中共安全及合法性所感到的威胁”。

2021年3月，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场高级别会晤，分管外事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会谈中强硬发言，一句被中国媒体形容为“金句”的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”，迅速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。

中国官方学者苏晓晖当时点评，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火爆氛围，是中国“保持对美国斗争来塑造中美关系的一个必然结果”。在中国国内政治转向“定于一尊”的这10年，中国外交也告别数十年来的韬光养晦，开启以“斗争”为主旋律的新时代。

中国外长王毅今年

7月在北京召开的“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座谈会”上总结，外交战线在过去10年“更加深刻领悟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勇于担当、敢于斗争的使命感”。

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《联合早报》采访时分析，中国过去10年处理外交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，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采取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姿态。“从前是‘打太极’、柔中带刚，现在是对抗式地正面回击，以斗争为主。”他举例，中国近年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，高调批评西方制度的落后、失效和弊端，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敢于斗争的表现之一。

中国加大影响力投射

事实上，无论是在传统的人权、意识形态争议，还是在国家安全、领土争端、海洋权益等问题上，中国都比以往强硬。

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的首五年，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军事部署、与东南亚其他声索国摩擦不断。后五年中，中国在新疆、香港

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，毫不示弱地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对等回击；北京也与加拿大陷入“人质外交”纷争；在台海方面，在民进党政府的“台独”倾向日益明显、台美关系更为热络的同时，北京则加大对台军事威慑，迈向“以武防独”和“以武促统”。

中国的外交风格也随之发生转变，外交官员比以往更咄咄逼人，他们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主动出击，抢占舆论阵地，捍卫中国立场。北京称之为“有所作为”，在国际媒体笔下是“战狼外交”。亮剑的同时，中国也在国际社会积极投射影响力。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，习近平在做政治报告时称，中国正“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”，宣示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的决心。

中国在全球发展上加大投入，最具雄心的莫过于打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丝路基金的组合拳；中国也试图在一些多边机制发力，在基础设施、气候变化、区域贸易等领域填补美国的空缺，力争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秩序。有着习近平明显个人烙印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以及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宏大论述，也在十九大被写入中共党章。

内部改变影响外交方向

外交政策与风格的调整，与中国自身经济、军事实力上升，以及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判断密切相关。

习近平在执政后提出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对国际格局做出“东升西降”的研判。尤其在冠病疫情暴发后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最初在应对疫情上治理失效，更让中国对自身的制度和治理充满自信。

北京试图告诉民众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混乱相比，疫情下的中国井然有序、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安全；中共领导人也说，“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”。

李明江说：“中国得出了一个核心结论，即现在整个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了……（北京）认为中国有这种基础，能跟西方国家在政治、意识形态上加大斗争力度。”不过，关于“东升西降”的研判，一直存在争议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在《当代美国评论》的专访中指出，近10年来，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于中国确实在下降，但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而言并未明显下降；较之于以往的霸权国家，美国现有的各种优势使其不至于快速衰落。

李明江也认为，“东升西降”的研判“有一厢情愿的成分”。

他指出，中共十八大后，随着中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、领导人确立“核心”地位，中共也在意识形态、媒体宣传、公众舆论等方面加强控制，让国内政治出现“左转”的趋势；北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，其实是与国内政治环境

相辅相成，形成逻辑自洽的关系。

内部的政治环境的改变，要求北京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时不能示弱，甚至要争取占上风。李明江说：“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，中国的外交这些年是受到中国内政的主导。”

拥鲜明领导人个人色彩 强硬外交将延续激进轨迹

除了中国国力与国际形势变化这些外在因素外，习近平主政10年期间中国外交的变化，也带有浓厚的领导人个人色彩。

美国华盛顿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（Stimson Center）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接受《联合早报》采访时说：“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采取新的强硬外交政策的必要但不充分（insufficient）条件，而习近平的领导是必要和充分条件。”

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唐安竹（Drew Thompson）受访时也分析，自信的“新时代”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的治理态度，而这种治理态度是“基于对中共安全及合法性所感到的威胁”。

他认为，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一个意识形态框架上，这决定了中国如何看待与世界的关系，也决定中国如何展开外交。这当中包含中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，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教条、列宁主义政治结构和中共提出的“中国特色”。